

文章编号:2095-0365(2013)03-0025-05

《小河》：“五四战士”的忧郁

耿宝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摘 要:《小河》时期的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战士,处处流露着他的“少年精神”,但《小河》蕴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隐的忧郁,体现着启蒙者的困惑,也昭示了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小河》之后不久,经过痛苦的思考,周作人开始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

关键词:《小河》;周作人;五四;战士;忧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小河》的文学史意义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着重于哲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对文学并不重视。1919年2月15日的第6卷第2号,却出人意料地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周作人的新诗《小河》。这样的编排,很是少见,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也刺激了周作人的热情,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了《微明》、《路上所见》、《北风》、《背枪的人》、《京奉车中》等不少白话新诗。

事实上,周作人从童年时就已经表现出他的思维是散文的,而不是诗的。此刻,他勉力写新诗,正如鲁迅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1]由于中国诗歌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为了使白话新诗能够占领诗坛,《新青年》同仁不得不协同作战。

这些“打打边鼓,凑些热闹”的、带有“跑龙套”意味的诗歌创作,却使新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小说一样,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按周作人在《小河·前记》里的说明,《小河》等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提倡的散文诗“略略相象”,“不过那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地分写了”,而且“无韵”。这种散文化的形式,是周作人对现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因为它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

束缚,与同一时期胡适的半新不旧的尝试体诗歌相比,多了一种形式的自由与自然。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朱自清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2]242}强调的正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在形式上的变革意义;胡适在《谈新诗》的时候,甚至因此将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2]3}

《小河》等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周作人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印象引入诗歌,从普通人的平凡人生中去发现诗,实践了他的“平民文学”的主张。这样的眼光与选材是全新而极富启发性的,正如冯文炳《谈新诗》所说:“一时做新诗的人大家都觉得有新的诗可写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以文学史家的身份断言:“早些日子做新诗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启示。”^[3]

二、五四战士

《小河》写于1919年1月,其时的周作人是名副其实的“五四战士”。1917年,新文化运动正勃然兴起,周作人恰于这年春天,由绍兴来到北京。9月4日,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很快以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成为了“卯字号的名人”之一。

收稿日期:2013-02-28

作者简介:耿宝强(1968-),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在《本志编辑部启事》中宣布,从该期起,“所有编译,悉有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这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发表于这一期,表明他此时已经成为了新青年社团的核心成员。

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说:“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也就是说,他把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看做了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因此,他首先是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而无论是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抑或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流露出他本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这固然是五四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折射。中国历史和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青春期。

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色——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在《译者前言》中,他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妇女”,表示“我确信这篇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该文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胡适在时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甚至称赞《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在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胡适认为,对“欧洲新文学的提倡”是五四文学革命建设阶段的重大收获,其中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胡适等倡议出版《每周评论》。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写出了《人的文学》。文章一出,轰动文坛。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胡适后来称《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4]29-30}

不久之后,他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发

表《思想革命》,强调就文学革命而言,用白话代替文言,或者说是文字改革,仅仅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因为白话文也可以宣传荒谬思想,而且比文言文宣传荒谬思想影响更坏。他说的荒谬思想,主要是指违背人性、无视人权、压迫和戕害人们的封建思想。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

此时的周作人,虽然由于个性的温和,不时地呼唤“中和”,但他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并因之在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中享有了极高的威信,到处演讲不说,还接受邀请担任了北大学生创办的《学潮》的主编,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乃兄周树人。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说,看了《思想革命》,他“很受点感动”,觉得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对《人的文学》,他“真佩服到极点了”,并将之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他认为“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著名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而他“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周作人“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4]204-206}

三、忧郁

在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周作人都表现出乐观、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并在新诗创作中时有表露。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号的《北风》中写到,“但觉得这风沙也颇可赏玩”,“这猛烈的北风,也正是将来的春天的先兆”,以象征手法描写自己冒着北风、奋然前行的情景,相当真切地展现了他以与困难拼搏为乐的精神。

但细细品味,这一时期周作人的诗作中仍然有一种隐隐的忧郁,这在《小河》中表现得更加深切。

《小河》的意象毫无疑问来自东南水乡,来自周作人的童年记忆,因此可以说,《小河》至少在潜意识上是包含着周作人的思乡情怀的。诗中“微笑”的、“稳稳地”、“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的、“被微风挽着走上河滩来时”发出“快活的声音”的“水”,寄托着诗人对于故乡以及故乡人的无限柔情。

但要理解周作人内心真实的表达,就必须了解“我”(稻子、桑树)对“河”和“农夫”(即“筑堰的人”)的态度。

“小河”曾经是“稳稳地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这是一幅很安静,很和谐的画面;“小河”也曾经是桑树的“好朋友”,“他送清水给我喝/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椹”,这时的“小河”和禾苗、桑树是一种滋润与被滋润的关系。“一个农夫背了锄头,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农夫的行为打破了“小河”与禾苗、桑树之间的和谐关系,“小河”内部有强大的力量,它随时都可能突破农夫筑起的堰,甚至会威胁禾苗,从它身上流过,也会威胁桑树,可能会“将他带倒在沙滩上”。

再来看“我”和“农夫”、“筑堰者”的关系。“农夫”、“筑堰的人”是破坏和谐的力量,他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筑了一道“土堰”,但很快就被“小河”冲垮,于是他又筑了一道“石堰”。这打破了“我”和“小河”之间的和谐,而和谐一旦被打破,“小河”就要寻求新的和谐,“我”其实也希望能够恢复以前的和谐,但这个恢复的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可能会随着“土堰”、“石堰”连带着一起被冲垮,被扼杀生命。这种矛盾也造成了“我”对“农夫”态度的矛盾,因为“石堰”虽然阻挡了“小河”,但它也在维持着暂时的平衡,保护着“我”不被“小河”冲垮。

“稻”毫无疑问是周作人的自况。作为阻碍小河的力量,“农夫”明显是统治者的象征,联系当时的政治情势甚至可以说,“土堰”就是满清政府,“石堰”可以看作是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之前曾经有过很大的兴奋,但发现革命后的情景已如革命前一样的时候马上变得非常悲观。在此基础上,理解“水”(“小河”)就容易多了。

稻子、桑树对于水,心情极其矛盾。既“喜欢水来润泽”它们,同情水“在地底里呻吟”,希望水“微笑着”稳稳的流着;又觉得水的呻吟虽然细微,却“如此可怕”,担心水“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从它们“身上大踏步过去”。

所以如此,是因为周作人在经历过义和团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运动,经历过仅仅12天就破产的张勋复辟闹剧,经历过中华民国城头“大王旗”的几度变幻后,已经脱离了幼时的天真、幻想,成了饱经风霜的“过来人”。如此,他回望故乡的小河,想到小河中的水,就不可能只看到美丽与和谐,而看到了更多残酷的景象:“水”一旦冲出河堤,万里平川就会在转瞬之间变成一路汪洋,从而毁坏稻子、桑树,并裹挟着它们顺流而下。“水”象征的是这块土地孕育的人民,他们长期受尽压迫,

不断地“呻吟”着,但他们一旦接受了新的思想,就很容易陷入迷狂,如冲出堤堰的“水”,爆发出“粗暴”的力量。25年后,在发表于《杂志》第14卷第1期的《苦茶庵打油诗·后记》中,周作人说:

孔子曰,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吾侪小人诚不足与语仁勇,唯忧生悯乱,正是人情之常。……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子是那篇《小河》。……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不幸他们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鄙人是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死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

因此可以说,“水”象征群众运动,诗中一再重复的“怕”字,流露出周作人一种难以遏制的忧郁,即他所说的“将来的忧虑”。也就是说,作为启蒙者,他已经预见到了启蒙的成果,那就是人的普遍觉醒,以及伴随而来的引起社会大动荡的社会革命。他为此而忧郁,而忧心忡忡。

这展现了周作人的痛苦:他是启蒙思想家,希望通过文字唤起人的自觉,并以之为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同时,他又发自内心的为几乎是必然产生的后果——即群众觉醒以后争取翻身解放的暴力革命——而忧虑。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要改变中华民族落后的现实,必须启蒙民众;但他又对民众摆脱蒙昧以后,必然导致的变革现实的“革命暴力”心怀疑惧。

这揭开了思想启蒙者在民众觉醒后必然面临的“两难”处境:加入狂热的群众队伍,被偏激的他们裹挟着参与激烈的革命行动,最终在与民众“同化”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异化”,失却了一个启蒙者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否则,就会被声势浩大的民众无情地抛弃,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都会被群众暴力毁于一旦,甚至连张平静的书桌也难以保留。周作人看到了这一切,自然满怀了忧郁。

在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前后,与青年由于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走向的认识模糊不清而忧郁不同,作为思想者的“五四战士”们大多是乐观的,就像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的忧郁显得很另类。这与《小河》所展现的对民众摆脱蒙

昧以后的“革命暴力”心怀疑惧有关,与他颇为喜爱的明代公安三袁的影响有关,更与他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因此,他才会抗战爆发后拒不南下,最后成为民族的罪人。

四、《小河》之后

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周作人正在东京。听到消息,他立刻往回赶,5月18日才到北京,但他依然感受到了那热烈的气氛。亲眼目睹的“六三”事件,是他第一次面对军警与爱国学生、与群众的对立,他甚至不由自主地暂时摆脱了一直纠缠他的疑惧心理,而沉浸在热烈、高亢的幻觉之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警厅逮捕后,他没有任何犹豫,即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前去探监。陈独秀出狱后,又前去慰问。风波基本平息以后,他又去日本待了一个月。在日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7月7日至7月11日对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留学期间,他就深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新村运动所吸引。现在置身其间,亲身体会到一种“人类之爱”,他内心的喜悦不可言说的,“令人融醉,几于忘返”。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乌托邦”,成为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回国后,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反复强调带有强烈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的理想”。

这样做,是周作人对五四时代思潮的呼应,更是对汹涌而至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依然疑惧的表现。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即将发生巨大的变革,他希望唤起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积弊,从而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不流血非暴力地实现变革。他认为,新村运动可以在避免“将来的革命”的前提下,“顺了必然的潮流”,“和平地得到革命的结果”;他主张“缓进的革命”,寄希望于“不劳而获”的“特殊阶级”的“翻然改悔”,而反对“翻天覆地,唯铁与血的暴力革命”。向往“社会主义”,又畏惧“社会革命”,是周作人此时的矛盾。

1921年1月至9月,周作人是在北京西山疗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在鲁迅的悉心照料下,他过着“自由宽懈的日子”。但这只是表面,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思绪一旦转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就身不由己地烦躁不安起来。他试图对自

己内心的矛盾,作一番理性的清理,总觉得很难。在写给孙伏园的信中,他这样说:

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科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5]

五四时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多元的,因为他们是怀着寻找救国图存真理的功利目的去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只要感觉可能有用,自然就先“拿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然要对自己“拿来”的太多的思想作一番清理。几经权衡以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上。前者,以同情下层贫苦民众、向往社会主义为特征;后者,以强调“个人本位主义”为特征。两者很难调和,更难兼容,必须放弃一种。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就不能不感到一种“无所归依”的彷徨,他的矛盾与烦躁就来源于此。

经过几乎一年时间的病中沉思、清理,周作人终于在同样吸引他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种思潮之间,做出了倾向性选择。在刊于1922年1月20日《晨报副镌》的《文艺的讨论》中,他说得很明白:“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两天后,他在《晨报副镌》开辟了名曰“自己的园地”的专栏。在第一篇的同名文章里,他说,要坚持“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

这表明,他放弃了自己多元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保留与发展了个人主义。此时的周作人,依然热衷于五四传统的传承。这对曾经全身心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周作人来说,正常不过。难得的是,他几乎是凭着自己的本性,就准确地把握到了五四传统中最本质的是“个体的解放与自由”。

于是,当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抛弃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周作人遵照自己内心的要求,高举着“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之后不久,通过与陈独秀围绕“信教自由宣言”的论争,他郑重宣布:要“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

参考文献:

[1]鲁迅. 集外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

[2]杨匡汉,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3]冯文炳. 谈新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3.

[4]赵家璧,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5]中国现代文学馆. 周作人代表作·雨天的书[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6.

The Rivulet : the Melancholy of a May Fourth Soldier

GENG Bao-q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creative period of *The Rivulet*, Zhou Zuoren fully deserved the name of the May Fourth Soldier, as juvenile vitality showed in his works unintentionally everywhere. However, *The Rivulet* also contained a faint melancholy held deeply in his mind that revealed the puzzle of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dilemma as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Soo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ivulet* and after painful thinking, Zhuo Zuoren began to hold the flag of individuality liberation and freedom to open up his personal creative garden.

Key words:*The Rivulet*; Zhou Zuoren; the May Fourth; soldier; melancholy

(上接第 9 页)

参考文献:

[1]王琳. 学校品牌扩展策划研究[J]. 2005(1):15-19.

[2]刘云. 高校无形资产管理对策分析[J]. 财会通讯,2011(26). :74-75.

[3]桑秀英. 高校无形资产有效转化研究[J]. 会计之友, 2011(18). :60-62.

[4]刘国华. 如何运筹学校的教育资源[J]. 中学教育,2003(2):7-9.

[5]汪成楚. 高校应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0-33.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angible Assets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HAN Dong-hai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become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while intangible asset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ry to remain invincible in development, the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tangible asse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eanwhile,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angible assets is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therefore, relate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se problems, explor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establish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assess the value of intangible assets scientificall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intangible assets management.

Key words:universities; intangible assets;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